

# 巴哈伊经典及其汉译概况

李绍白\*

摘要：巴哈伊信仰的经典异常丰富，可谓汗牛充栋。中国学人百年来将其最主要的经典已经译成中文，对部分海内外华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巴哈伊经典翻译有着自己独特的原则和术语体系，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某些稳固的传统，但在很多方面仍需继续探索，汲取其他经典翻译的术语和经验，努力追求信、达、雅，以提升其传扬圣道、灵性教育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关键词：巴哈伊，巴哈伊启示，巴哈伊经典，巴哈伊英文官定本，巴哈伊经典翻译原则，巴哈伊经典汉译概况，巴哈伊经典汉译课题

## 一、巴哈伊启示体系及其经典文库概述

### 1, 巴哈伊信仰及其启示体系

巴哈伊信仰 (Bahá'í Faith, 亦译巴哈伊教) 的前身为巴布教 (Bábism, 亦译巴比教) 其信徒被称为“巴比” (Babí), 由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 (Siyyid 'Ali-Muhammad, 1819~1850 年) 1844 年创立的波斯。该年的 5 月 22 日 (回历 1260 年 5 月 4 日), 他在设拉子的寓所对后来成为其首个门徒的穆拉·侯赛因 (Mulla Husayn) 公开了自己作为上帝显圣的身份。这一事件成为一个新的启示体系问世的标志。但在他宣示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所谓的主流历史观点将其视为宗教内部的一场改革运动 (新中国前 50 年间的官方教科书和工具书甚至将其视为“起义”)。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曾为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教派的信徒, 他在二十几岁便提出了在当时堪称骇世惊俗的主张, 直接导致了官方与正统势力的反对和迫害, 并不断升级, 最终演变成大范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和杀戮。在波斯全境, 仅仅数年间, 便有 4 万多巴孛的追随者为其信仰献出了生命。他本人也在 1850 年被当局处死, 年仅 31 岁。

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给自己取名“巴孛” (Báb, 波斯语意为“门”), 按他自己的解释, 他的使命是为另一位更伟大显圣的来临铺路。巴孛的一生极为短暂,

却遗留了大量的文字，主要代表作是《巴扬经》（*Báyan*），至今仍未见到完整的译本。该经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的心智与能力将从迷信中被解放出来，出现全新的学术与科学，甚至于连小孩子的知识都会远远超过现在的所谓饱学之士。

在很大程度上，巴孛的教义只有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为人理解：他的听众和读者的思想都被禁锢在一个冥顽黑暗、几近停滞、与欧洲中世纪没有多大不同的精神世界里，且更为愚昧，更为孤独，更受“命运”的摆布和捉弄。巴孛的教义旨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富于生命力的社会概念，同时又保留了大部分听众和读者所熟悉和习惯了的文化和宗教成分。在短暂的一生中，巴孛为他所描述的新社会制订了一套律法系统，以及有关信仰的祷告、沉思和道德等戒律。巴孛一再强调，

\*李绍白：翻译工作者，（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名誉社长、主编，曾翻译巴哈伊经典多部，并著有《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让我们因信而仰》等。

他本人只是所有宗教所期待的那位显圣的先驱，他的教义也只是那位显圣将带来的更伟大启示的序曲。

在十九世纪中叶，巴孛所发起的新启示运动如火如荼，兴盛一时，几乎波及波斯全境，并影响到周边地区，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然而，当局的严酷打压，他的殉道，加上大批信众在武装抵抗运动中的伤亡、被俘和离散，使得这场运动也迅即消沉。然而不久，巴孛的一位忠实追随者便挺身而出，将幸存的巴比教徒聚拢起来，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他就是后来被称作“巴哈欧拉”（*Bahá'u'lláh*，中国大陆又译为“巴哈·安拉”、“巴哈·乌拉”或“巴哈-安拉”、“巴哈-乌拉”）的米尔扎·侯赛因-阿里（*Mirzá Husayn-'Ali*，1817~1892）。1863年4月22日傍晚，他首度向随行的信徒宣示，他就是世人所久盼的显圣，是巴孛所预言的那位更伟大的先知，是末代伊玛目的再临，是摩西所许诺的救世主，是耶稣所许诺的真正的神灵穆罕默德所许诺的至大宣示着，是上帝将昭示天下者，是过去所有宗教预言及圣书所承诺之应验。他将自己的追随者改称为“巴哈伊”（*Bahá'í*，意为“荣光之众”），这便是巴哈伊教或巴哈伊信仰的由来。

巴哈欧拉的一生堪称现代基督的传奇，他的大半生都是在颠沛流离的流放或监禁生涯中度过的，尝尽人间种种苦难，至死仍未卸去囚犯的身份。生于伊朗德黑兰的他，先后被放逐到伊拉克和土耳其，最终被囚禁于时属巴勒斯坦的监狱之城阿卡（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古老军事要塞，18世纪起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用于监禁政治犯和刑事重犯），1892年在离阿卡数十公里的海法（今属以色列）去世。然而，尽管深陷苦难和逆境，他的启示却源源不绝，独自创立了一个切合时代需求的新信仰体系，给罹患重症的人类投下了一剂剂神医良方。

巴哈欧拉声称，他的教义主要旨在满足现今的人类迈向集体成熟以及未来一千年的需要。为此，他不仅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大同的实现阐明了自己的宗旨和训诫，还亲笔勾勒了不乏细节的具体实施蓝图和要素，如新世界文明体系、新世界秩序、世界联邦政府、世界法院、国际警察和部队、全球普及教育、全球通用语言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华伦·瓦格所言：

“在所有声称拥有神授权威的当代积极进步的宗教里，唯一毫不含糊、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统一人类工作的就是巴哈伊信仰”。<sup>①</sup>

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可简明地概括为“三个一”或“三一”：

A.上帝唯一。巴哈伊认为世人所崇拜的神尽管名称各异，五花八门，但实为同一个对象，即超乎凡夫俗子认知极限的所谓“终极本体”或“万象之因”。

B.宗教一致（或宗教同源）。巴哈伊认为世间存在的林林总总的宗教都是由上帝所派遣的使者分别创立的，尽管其时代和使命各有不同，但其神圣来源是一致的，是同一神圣真理的不同表述。

C.人类一体。巴哈伊相信人类为上帝所单独创造，同属一个种族，人人生来高贵且平等，人类间的差异只是非本质性的。而人类整体成熟或人类整体演进的最高与最后阶段乃是天下大同。这也是巴哈伊信仰在很长一段时间（民国时期及台湾地区直至八十年代末）被译作“大同教”的原因所在。巴哈伊所追求的“大同”是尊重并保持多样性前提下的人类统一和团结，可简单表述为“一体多样”或“存异求同”。

---

<sup>①</sup> 李绍白：

《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序言”，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10年第4版。

其他重要教义还有：独立探求真理，普及教育，社会与经济公正，两性平等，消除偏见，科学与宗教的和谐，适度原则（亦译中庸原则）。

## 2, 巴哈伊信仰经典文库的构成

从 1844 年（巴哈伊历元年）算起，巴哈伊信仰的全部历程尚不到 170 年，可谓现代新兴宗教，其主要经典、文献和文字记载得以保存并流转至今，从而给有志研究者提供了远较传统宗教更加有利的条件。

巴哈伊信仰经典文库的核心由三位所谓“中心人物”（Central Figures）的启示和著述构成，除了巴孛和巴哈欧拉，还有阿博都-巴哈——巴哈欧拉的长子及其指定继承人，他不具备显圣或先知的地位，但作为巴哈欧拉启示的权威诠释者，其著述和言论亦具有等同于圣作的地位和效力。如此情形在其他各大宗教里尚未见到。

巴哈伊经典文库的次要构成部分被称作“圣护”（Guardian）的巴哈伊教最后一位指定领导人守基·阿芬第（Shoghi Effendi，按大陆标准应译为“绍基·埃芬迪”）的著述、译作、书信以及巴哈伊全球最高行政管理机关世界正义院（World House of Justice）的官方文告和文件。

巴孛、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为数众多的手稿和书简至今仍由世界正义院属下的专门机构（巴哈伊文献研究中心，位于以色列海法市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建筑群内）进行鉴别、整理、辑编和翻译。巴哈欧拉的启示周期与其被放逐的流亡生涯是一致的，长达 40 年，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手稿和书简，其中很多由他本人亲笔启示，如此情形是传统宗教所没有的，其余则是授写，或是由信徒记录其话语并得到其首肯确认的。在绝大多数时期，阿博都-巴哈都陪伴着巴哈欧拉，扮演着他的助手和秘书的角色。同时，在很多时候，巴哈欧拉还有专门的秘书，随时记录他的言行。尽管处境恶劣，颠沛流离，但他的绝大多数文字得以保存至今，这不可不谓奇迹。

## 二、巴哈伊经典的官定英文本概念

尽管巴哈伊信仰三位中心人物所遗文字甚丰，但迄今为止得到出版或公布的仍为

其极小部分。这主要是因为两个互为关联的原因：

- 1, 这些文字只限于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巴哈欧拉有极少量书简用土耳其文启示），且基本上是在极度困难的境况之中启示的，多为断续的手稿，其保存也因严酷条件而多有残损。因此，整理、校勘和编辑这些启示文字便成为必要，这项工作主要由圣护守基·阿芬第开启和领导，由他的助手、友人及后来的世界正义院巴哈伊文献研究中心具体从事。作为巴哈伊信仰最后一位权威诠释者，守基·阿芬第对前辈的文字亲自作了大量重要的注解和阐释工作。
- 2, 守基·阿芬第曾在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就读，在英国也居住了不短的时间，精通英语。他意识到，作为西方世界最通用最强势的语种，英语可以成为传扬圣道的至关重要的工具。因此，圣护的整理、翻译和诠释工作基本上是通过英语进行的，他呕心沥血整理并翻译了大量的圣作，不仅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巴哈伊信仰的最主要来源，也由此确立了世界其他语种翻译的基本依据：巴哈伊经典官定英译本。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巴哈伊经典的英译本是唯一的，即同一圣典只有一种英译本得以确立和使用，譬如《隐言经》（Hidden Words），先后有多人独自翻译，但只有圣护在友人协助下所翻译的版本得到官方确立，成为其他语种翻译的唯一根据。

守基·阿芬第于 1957 年去世后，作为巴哈伊官方唯一专事经典文献研究、整理和翻译的专门机构，世界正义院巴哈伊文献研究中心继续他的工作。不过，对原典的翻译多半以集体形式进行，而非个人，关于此点，后面将要论述。与圣护的译作相同，经由该中心推出或核准的英译本自然成为巴哈伊经典的唯一官定译本，其他语种的翻译皆须以此为据。须提及的是，位于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包括世界正义院和巴哈伊文献研究中心等在内的扇形建筑群）的唯一通用工作语言也是英语。

“巴哈伊经典官定英译本”对世界其他语种的翻译工作来说已成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它意味着所有其他语言翻译巴哈伊经典文献必须以官定英译本为依据，不能随意直接翻译经典原作。也就是说，即便译者精通原作语言，也不能直接翻译经典原作，至多只能将其当作参考及核对之用。与世界其他各大宗教比较，这一做

法是独一无二的。我个人相信，这一做法极其睿智，它实际上起到了维护神圣经典一致性的作用，进而有助于维护巴哈伊信仰界的团结。

这里我们不妨做个有趣的比较：《圣经》的英语翻译历史虽然只有几百年，但译本不计其数，而在当今世上流行的版本也不下二十种。《古兰经》的情况也类似，不存在通行世界的唯一英译本。至于汉译本，仅从上个世纪至今，约有 14 种面世。<sup>①</sup>中国大陆最为流行的马坚译本尽管得到官方确认和推广，但也没有因此而成为“唯一”。

佛教经典的汉译若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者伊存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使伊存得以记录的《浮图经》算起，超过两千年，其间，安世高、释道安、释彦琮、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天息、法护和赞宁等大家的译作可谓数不胜数，流行于世或得到官方确认的译本也可谓林林总总。

然而，如此情形在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及其出版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根据 **OCEAN**（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网上宗教文献资料库）的统计结果，巴哈欧拉著述被译成英文（仅指得到官方认可的，以下同）的总量为 537,000 个英文词，如果按平均每个英文词译成 2.5 个汉字，那么折算成汉字则为 1,342,500 个。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的著述约为 2,600,000 个英文词，折成汉字为 6,500,000 个。世界正义院的文献约 1,300,000 个英文词，折算成汉字为 3,250,000 个。

上述折成汉字总量为 11,092,500 个。

然而，巴哈伊经典官定英译本的数量仍在增长，尽管比较缓慢；而世界正义院文件（包括以巴哈伊国际社团名义发表的声明、文告和各类国际论坛、会议发言）及函件的数量每年不断递增。可见，与传统宗教完全不同，巴哈伊经典文库是个动态的概念，它一直在不断增长和扩大，无论是核心部分还是次要部分。如前所述，巴哈伊经典的英文翻译是由巴哈伊文献研究中心主理或主导的，具有唯一的官方地位和资格。当然，任何信徒个人都可以对经典进行英文翻译，但若欲出版或发表，必须事先得到该中心的审批。

---

<sup>①</sup> 据网易博客“伊儿的日志”。

其他语种的圣经翻译和出版则有些不同，它们基本上是由“总会”一级的机构或总会所任命的翻译出版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负责的。巴哈伊的教务管理架构大致分为三级：世界正义院及其附属机构（对外亦称“巴哈伊世界中心” < Bahá'í World Center>），国家总会（含独立属地之类的区域），以及总会属下的地方分会。目前，国家级总会的数目已超过 200 个，在全球地理分布上排列第二，仅次于基督教。巴哈伊圣经被翻译的语言迄今已逾 800 种<sup>①</sup>。

由第二级教务管理机构“总会”主理或主导的其他语种的圣经翻译则属于各地“自主性”的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并未明文规定译本必须具有“唯一性”。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只能有一种译本施用，这条原则可理解为次一级的“唯一”。譬如，巴哈欧拉的《隐言经》曾有多多个汉译本流行，从民国时代至今，不下六、七种（包括港、澳、台），但在某个时间段里，在某个总会管辖的范围内，永远只有一种被该总会所确立使用。其实，英译本的唯一性在时间上也并非“绝对”，譬如，某英译本在相隔二十年后的版本会有稍许不同，尽管此情形很少见。翻译工作者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根本上而言，翻译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任何译作都不可能达至完善或完美；即便同一译者，在不同时间也会对同一翻译对象产生不同理解或译法。一言以蔽之：翻译永无止境！在需要最高程度的使命感、责任心与忠实精神的宗教经典翻译上，就更是如此。

以下为巴哈伊国际社团官方网站 Baha'i Reference Library 所载的现有巴哈伊经典英译本目录。

\* 括注均指中文翻译及出版情况

### **巴哈欧拉：**

The Kitáb-i-Aqdas（《亚格达斯经》，已翻译出版）

Synopsis and Codification of the Laws and Ordinances of the Kitáb-i-Aqdas（《亚格达斯经律法纲要》，已翻译出版）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未翻译出版）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Hosts（未翻译出版）

The Kitáb-i-Íqán (The Book of Certitude)（《笃信经》，已翻译出版）

---

<sup>①</sup> 万兆元：2012 年，广州首届研讨会论文集第 130 页。

The Hidden Words (《隐言经》，已翻译出版多个版本，现中国大陆唯一通用版本为诗歌体译本)

The Seven Valleys (《七谷经》，已翻译出版两个版本)

The Four Valleys (《四谷经》，已翻译出版)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未翻译出版)

Prayers and Meditations by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祷文与默思录》，已翻译出版)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著作拾穗》，已翻译出版)

The Tablet of the Branch (未翻译出版)

The Proclamation of Baha'u'llah (未翻译出版)

Gems of Divine Mysteries (《圣秘瑰宝》，已翻译出版)

The Tabernacle of Unity (《大同圣帐》，已翻译，拟出版)

#### 巴孛：

Báyan 全本尚未译成英文，部分段落的英译散见于其他出版物或教材。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The Bab (未翻译出版)

#### 阿博都-巴哈：

Tablets of Abdul-Baha Abbas (共三卷，未翻译出版)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著作选集》，已翻译出版)

Tablets of the Divine Plan (未翻译出版)

The Will and Testament of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遗嘱》，已翻译出版)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已答之问》，已翻译出版)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神圣文明的奥秘》(已翻译出版节译本，全本正在进行翻译)

Foundations of World Unity (《世界团结的基础》，已翻译出版)

Paris Talks (《巴黎谈话》，为首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译出版的巴哈伊经典，现行版本为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出版的译本)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弘扬世界和平》(已翻译出版)

Baha'I World Faith (Abdu'l-Bahá's Section Only) (未翻译出版)

A Traveler's Narrative (未翻译出版)

Abdul Baha in London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已翻译出版)

Memorials of the Faithful 《忠信群英传》(已翻译出版)

Tablet to August Forel(《致弗雷尔书简》,已翻译,辑录于《毁灭或新世界秩序?》)

**守基·阿芬第(圣护):**

God Passes By (已翻译,拟出版)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未翻译出版)

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 (未翻译出版)

The World Order of Baha'u'llah (已翻译出版)

Dawn of a New Day (未翻译出版)

Bahá'í Administration (已翻译出版)

Citadel of Faith (未翻译出版)

Directives from the Guardian (未翻译出版)

High Endeavours - Messages to Alaska (未翻译出版)

Letters from the Guardian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未翻译出版)

The Light of Divine Guidance (Volume I, II) (未翻译出版)

Messages to America (未翻译出版)

Messages to Canada (未翻译出版)

Messages to the Baha'i World—— 1950-1957 (未翻译出版)

The Unfolding Destiny of the British Baha'i Community (未翻译出版)

Arohanui: Letters to New Zealand (未翻译出版)

**世界正义院:**

重要的声明和文告已有部分翻译并出版(尤见《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

其他重要官方文献:

Century of Light (已翻译,拟出版)

One Common Faith (已翻译,拟出版)

Statement on Bahá'u'lláh (未翻译出版)

世界正义院尚有大量的文集、汇编等,如 Principles of Bahá'í Administration, Baha'i

World Faith, Bahiyyih Khanum-The Greatest Holy Leaf, 均未翻译成中文并出版。

### 三、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原则

巴哈欧拉晚年期间,来自西方世界的学者和社会高位人士便与其有所接触和交往。到了阿博都-巴哈时期,这种交往就更加密切。他对巴哈伊信仰传播到西方世界寄予厚望,并为此不顾年迈体衰,先后两次造访欧洲和一次造访北美,作了大量的演讲和谈话,所到之处无不掀起“巴哈伊热”。他对巴哈伊圣作的翻译作有明确的指示,他本人也曾学过英语和法语。而他在欧洲和北美的演讲录也最先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到了守基·阿芬第的使命期,情况又有了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他本人母语为波斯语,同时精通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因此,他就成为将信仰通过翻译推荐给西方的不二人选。在担任圣护期间,他翻译了5部巴哈欧拉重要著作:《隐言经》、《笃信经》、《巴哈欧拉文萃》、《巴哈欧拉祷文与默思录》和《致狼子书》,此外,他还在其大量书信(包括授写的)中引用了自己翻译的不计其数的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著作的选段或摘句。长达20多年的翻译工作不仅硕果累累,其卓越译作更为巴哈伊经典翻译树立了丰碑和典范。同时,他厘定了巴哈伊专有名词的音译规范和体系,确定了巴哈伊重要概念和术语的标准译法。他的译文不仅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深邃旨意,还通过一种近似钦定版《圣经》(詹姆士版)的文体和风格恰当地再现了圣作原文的崇高神韵。这些都成为后来的英译者所应遵循的标准或参照的楷模,世界正义院为此曾明文提出要求(1981年5月31日致某翻译委员会函)。<sup>①</sup>

作为阿博都-巴哈指定的身后继承人,守基·阿芬第既是巴哈伊世界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巴哈伊圣作的权威诠释者,加上译者,如此三重身份在整个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的带有诠释成分的圣典翻译无疑具有至高的权威性,与一般的译作不可同日而语。

1957年守基·阿芬第去世后,巴哈伊圣典的翻译由1963年经普世选举产生的世

---

<sup>①</sup>万兆元,2012年首届宗教经典翻译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

界正义院接续，主要采取翻译委员会或翻译小组的方式进行，这也是阿博都-巴哈所提倡的“集体翻译”形式。1992年巴哈欧拉升天一百周年之际，他最重要的启示之作《亚格达斯经》（《至圣经》）的英译本便是在世界正义院的主理下出版的。该院对巴哈伊圣作的翻译原则也作了诸多阐释和指示，主要散见于公函和批件。

巴哈伊翻译的首要原则是译者必须了解巴哈伊圣言的性质，此为从事巴哈伊经典翻译工作的基本前提。巴哈欧拉说：

凡词语皆具灵气，是故，言者或释者须在适当之时间及场合审慎述说，盖因言语予人之效果无疑是显然且可感觉的。圣贤曰：言语既可如火，亦可如光，二者在世界所施加之作用显而易见。故而，明达事理者之言说须如母乳般温和，以使人类之子得到教化和启迪，从而能达到人生之最高目的——大彻大悟及高贵之地位。圣贤亦曰：言语既可如春天，能使知识玫瑰园的幼苗成长、茂盛和绽放，亦可如致命毒药。故而，睿智者须以至为仁慈与宽宏之心态言说，使每个听者能从自己的美好言辞中受益，进而提升为人之地位。

我的朋友啊！上帝之言乃是言词之王，其统摄之威力无可估量。它一直且将永远支配存在界。圣贤曰：圣言乃是整个世界的万能钥匙，因为在它的作用下，人类的心灵之门——实际上是天国之门——开启了。仅其璀璨光辉之一线照耀爱之镜，它便能立刻反射出福佑之语“吾乃最受敬爱者”。圣言乃是取不尽、用不竭之巨大宝库，万事万物尽在其中。诸事物仅其光辉之发散而已。圣言之地位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它乃是隐藏于赞美和崇拜之中的崇高及荣耀之真谛的所在之处。

具体到翻译必须遵循的原则，阿博都-巴哈说：

关于翻译天佑美尊（指巴哈欧拉）撰写的圣典和书简问题：不久以后它们将被翻译成所有的语言，译文须表现力强，意思明白，风格优美。在它们准确地、有表现力地、风格优美地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时，其内在含义的光辉将照射到国外，将照亮人类的眼睛。你要尽最大努力确保译文和原文保持一致。

守基·阿芬第说：

巴哈伊教的经典与科学论文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人们必须记住，显圣使用的是人类语言这一不能胜任的工具，来传达能提升人类远远高于目前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真理和指示。

世界正义院指出：

我们认识到，翻译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无论一篇译文的质量是多么优秀，人们对其准确度和风格的评价总是有分歧的。然而，在翻译巴哈伊经典时，重要的是应牢记原文的风格是高雅庄重，这一特点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不应该丧失。例如，人们可能注意到，敬爱的圣护在（将巴哈伊经典）翻译成英文时，使用了一种和现代英语用法大相径庭的风格，但这种风格却是令人钦佩地与原文的意味深长和形象化描述相般配的。

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原则可具体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 1, 忠实性——除了尽最大可能忠实于原文（英译本），不误解、曲解、删节或任意添加，还须尽可能完整体现出原文的意蕴、风格和韵律，此为巴哈伊经典翻译工作的首要原则。不同语言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等性”，何况英汉这两种语言的迥异以及经典所带有的文化背景与译出语的不同，这就给何为“忠实”带来探讨和商榷的余地。可以说，巴哈伊经典的汉译一直伴随着这方面的探究以至争议，汉译诗歌体《隐言经》在这方面可谓最为典型之一例。（可参见《隐言经》的“译后记”）。最新出版的汉译巴哈欧拉启示之作《七谷经与四谷经》（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2013 年 5 月）亦可作探讨之案例：原作明显带有伊斯兰教苏非派风格，大量使用修辞、借喻、类比等，很多概念和表述在汉语言里找不到直接对应关联，至于苏非派文学传统本身，包括其信仰与哲学背景，更是令以汉语为母语者感到遥远和陌生，理解起来殊属不易……这些，都对翻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 2, 文学性——追求高雅优美隽永的文风，不一味迁就读者的阅读水平，这一要求可谓是巴哈伊经典翻译所独有的。守基·阿芬第要求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工作者力求“最高的文学水准及风格”，不赞成过于考虑读者的文化程度及接受水平。他的翻译采用类似詹姆士王圣经版的文体，世界正

义院要求巴哈伊经典的译者以其为楷模，它自己的众多文告和函牍也采用类似的文风。不少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甚至有些大学程度的读者）都反映巴哈伊经典的英译本难读难懂。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隐言经》的诗歌体汉译工作专门请了一位诗词专家做文学顾问。尤其祷文和很多要求背记的经文段落，尽可能具有译出语上的可诵读性（伊斯兰吟诵传统极难由汉语体现），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总之，既对文学上提出高要求，又对经典的普及寄予厚望，这实际上构成了翻译工作无法回避的一对矛盾，也可以说是双重挑战。《隐言经》汉语诗歌体译本的读者定位为“高中文化程度”，但仍有人认为其中有些诗段不免“流俗”。

- 3, 翻译根据——圣作翻译皆须以官定英译本为准，原文（主要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仅供参酌之用。当然，如有必要及能力，可以核对原本。
- 4, 提倡集体翻译——守基·阿芬第的多数译作是在友人的协助下完成的，这其实就是一种集体翻译形式。在巴哈伊经典汉译的摸索与实践过程中，集体翻译形式的运用尚属少例，如巴哈伊启示的核心圣作《亚格达斯经》的中译本，翻译和审校者达 13 人，先后参与阅评工作的多达数十人。《隐言经》诗歌体汉译虽为一人所为，但参与审校和阅评者亦有数十人之多。我们构想，巴哈伊重要经典的新译或重译，尽可能采用任务“团队”或“小组”形式。譬如《巴哈欧拉文萃》中文版的重译团队，设想由翻译、文学、审校和阅评这四个方面的人士组成。
- 5, 审校与审核程序——巴哈伊经典的译稿要求不少于三人审校，核心或重要圣作视具体需要还可增添“阅评”这道程序，参与者有时会多达数十人，以从多方面多批次保证译作的忠实准确并力求完善。在译稿定稿后到付梓出版前，还需经过“审核”这道程序，通常是由总会专门成立的翻译出版委员会或类似机构进行的，有时则是由总会任命若干合格人士组成的固定或临时的任务团队来进行。至于英译稿的出版，无论何国何地，一律须经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审核批准。

## 5, 官方认可程序

- A. 任何人，无论信徒或非信徒，均可自由翻译任何巴哈伊经典，但其出版发行

或任何正规媒体或渠道的发表须征得相关巴哈伊总会的审核批准；如前所述，如果译作是英文，则须由巴哈伊世界中心审核认可。

B. 若系个人自发翻译的圣文，经由译者许可，巴哈伊总会可以使用，但无权强制征用。署名与否，亦尊重译者自身的意愿。

C. 任何译作若由巴哈伊所属出版社出版，均需由一个类似翻译出版委员会的机构事先审核，经认可后方能出版，该机构通常由总会设立，或是由总会任命组成的临时任务团体。

6, 译本唯一性——如果出现多个译本，则在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译本使用，无论发表或印行。

尚须提及的是，巴哈伊信仰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组织，因此，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审校和阅评工作并不限于巴哈伊信徒圈子。就巴哈伊经典的汉译情况来看，先后有很多非巴哈伊人士参与这些工作，其中包括中国大陆的学者和专家，如巴哈伊核心圣作《亚格达斯经》，四位译者皆非巴哈伊，而审校者和参与阅评者也并不都是巴哈伊。巴哈伊经典的汉译事业可谓任重道远，因此它被寄望于将来会有更多的热心与有志人士——无论巴哈伊还是非巴哈伊——的积极参与和奉献。

#### 四、巴哈伊经典汉译概况

阿博都-巴哈生前曾对中国寄予厚望。他称中国为“未来的国家”——不到一百年的光阴，他的睿智预见便得到证实。他在一份著名的书简里写下这样一段激昂的文字：

中国，中国，到中国去！巴哈欧拉的圣道一定要传到中国。去中国传导的圣洁巴哈伊在哪里？中国有最大的潜力，中国人的心灵最纯朴，最爱追求真理。向中国人传导，自己先要具备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经书，了解他们的习俗，从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交谈。传导者必须时刻惦记中国人的精神福祉，不得有任何私念，在中国，一个人可以传导很多人，可以培养出具有神圣品格的杰出人士，而他们可以成为照亮人类世界的明灯。我真切

地说，中国人不爱任何形式的欺诈和伪善，易为崇高理想所激励。可惜身体状况不允许，不然我会亲自去中国……

中国是未来的国家，我希望适当的教师能受鼓舞而到那广大的国家，建立上帝王国的基础，促进神圣文明的本质，并高举巴哈欧拉圣道的旗帜去邀请人们参加上帝的圣宴。

早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便陆续有来自波斯的巴比和巴哈伊在中国从事经商和传教活动，但较为稀少零星。直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巴哈伊信仰才开始在中国有了较大范围和系统的传播。此期有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加入了巴哈伊信仰，并与上海成立了大同教社，该社出版了数十种巴哈伊有关著作。随着这一传播进程，巴哈伊经典的汉译开始了第一次的蓬勃兴起，到了 40 年代初，当时主要的巴哈伊圣作英译本多数被译成中文，其中以曹云祥最为多产，共计译有（包括非圣作）：《亚卜图博爱（今译阿博都-巴哈）之箴言》、《已答之问题》、《笃信之道》、《至大之和平》、《世界之趋势——大同教宣言》、《新时代之大同教》（今译《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大同教预言之实现》。还著有《巴海（今译巴哈伊）的天启》和《大同教之贡献》两本书。“大同教”这个译名，就是由曹云祥最先使用的，因为他觉得巴哈伊信仰的人类一体观与中国古代圣贤的大同理念有共通之处。作为中国现代工商管理的先驱、清华大学之父和知名外交家与社会活动家，曹云祥曾经名噪一时，无论从何角度讲都算是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但自新中国成立后，对他鲜有提及，遑论研究。1996 年，中国首个巴哈伊研究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挂牌成立，然而，从该中心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之中，仍然找不到任何哪怕提及曹云祥的内容。1994 年澳门出版的首部中文介绍巴哈伊信仰的书籍《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在最后一章“巴哈伊信仰与中国”用了数段文字讲述曹云祥，这可能是在中国范围迄今所能发现的自 1949 年后最早提到曹云祥与巴哈伊关系的文字。自本世纪伊始，才有大陆学者开始填补这一空白，本人所见最早的是雷雨田教授，他在 2003 年的一篇论文《孙中山与大同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对曹云祥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直到 2011 年，清华大学建校百年之际，相关的研究专著才得以面世，它便是蔡德贵的开创性建树《曹云祥——清华大学之父》，这部两大本的巨著给我们全方位呈现了一个长期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形象。

关于曹云祥的翻译成就，万兆元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将在本会发表，因此本文不拟赘言。

另一位具有突出贡献者是廖崇真。他于1921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接触巴哈伊信仰并在同年入教。1923年春，他返回故乡广州，之后开始了服务信仰的各种努力，其中之一便是翻译巴哈伊典籍。他先后翻译了《隐言经》（1937年洛阳印务馆出版时名为《大同教之隐言经》）、《已答之问题》、《巴哈欧拉书简集》、《阿博都-巴哈论神圣哲学》、《巴哈欧拉祷文与默思录》。廖崇真与当时的巴哈伊信仰领导人守基·阿芬第曾有直接的书信联系，这表明了他在中国巴哈伊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在1938年的一封致圣护的信函里，他这样写道：

“我是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完成这些书的翻译工作的，因为我坚信只有巴哈欧拉的原则能最终拯救这个世界，我将会在这场即将带来的潮流中做好自己的工作。”廖崇真的工作受到了圣护的赞扬，他和他的家人的照片被圣护挂在位于阿卡的巴哈欧拉故居的墙上，很多中国巴哈伊朝圣者都看到这张令人倍感亲切的照片。<sup>①</sup>

这个时期的巴哈伊经典汉译，基本上用文言体。到了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巴哈伊经典汉译及其出版陷入停顿状态。廖崇真的一些译稿也因此未能出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巴哈伊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完全停止，只有港、澳、台还在继续，而巴哈伊经典的中文翻译也因此自然在此三地转续。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台湾巴哈伊总会开始自行组织翻译和出版巴哈伊典籍，包括《隐言经》、《毅刚经》（即《笃信经》）、《巴哈伊祷文》和巴孛的传记《释放太阳》等。之后，香港、澳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也出现了各自的巴哈伊经典汉译本，不过总体上看都是较为零星分散的行为，且无论翻译质量和水准，都鲜见上乘之作。

直到1996年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在澳门成立，这一情况才从根本上有所改观。从此以后，巴哈伊经典的汉译事业可以说进入了第二个兴旺时期，无论从事翻译的人数还是译作产量，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而且，自新纪元国际出版社诞生之日起，上述其他地区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已日渐萎缩，近些年更是鲜有译作出版。

---

<sup>①</sup> 雷雨田，2003年，第33~34页。

因此可以说，巴哈伊的中文翻译和出版事实上已逐渐形成了以新纪元国际出版社为中心或主导的格局。而自 2009 年新纪元走上专业化道路之后，便更是如此。目前，无论在编辑人数或出品数量方面，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已成为全球巴哈伊翻译和出版行业中最具规模者。

巴哈伊经典汉译的一个有别于其他语种翻译的特征恐怕在于：繁简体两种不同的译本。在民国时代，尚未有简体字流行，因而不存在如此区别。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提倡简体字，而港澳台地区仍沿用繁体字，区别由此形成。到如今，尽管港澳地区乃至海外华人社区越来越多使用简体字，但基本区分格局仍未显著改变。实际上，字体的区别尚属小处，观念及表达方式的分野才是大处所在。譬如，长期不相往来的大陆与台湾之间在语言风格和表达习惯上已出现诸多不同之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台湾仍较多地沿用民国时代的语言风格和习惯，也就是说更“守旧”更“传统”一些。因此，尽管现今的台湾地区已很少出版自己的译本（除了教材），依然很少使用新纪元的出版物，因为很多台湾巴哈伊表示，这些多少带有大陆语言风格的译本让他们读起来或朗读起来觉得多少有些别扭。

## 五，巴哈伊汉译的主要课题

### 1，语言风格：白话文还是其他？

民国时代的文言体汉译，无疑已是历史遗风，不可能被当今的译者照搬传承。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巴哈伊经典的汉译要么是现代白话文，要么是白里夹文或半文半白的文风。然而，既然是经典，就应该有别于一般的文献，无论是力量或分量感、文学性甚至字面上给读者的感觉，都更加讲究才是，这就形成了巴哈伊汉译的第一个课题或挑战。

确实，就多数译者而言，对巴哈伊经典英译本的第一感觉会是“高雅”和“高深”兼而有之，因而在动笔翻译时自然会想到尽可能用汉语再现同样的神韵和意趣。本人是大陆生长的60后，不仅早已过了文言文时代，且所受文言文方面的教育少得可怜，所有的一点文言底子也是基本上靠自己阅读古文获得的。但即便如此，本人在翻译巴哈伊经典时也时常感到踌躇与困惑：该“文”一点，还是该“白”一

点？《隐言经》诗歌体译本便也不免表露出如此矛盾：有些非常“文”，如  
不欲人咎己，  
切勿咎于人；  
己所未行，  
勿加妄语，  
此言是训，  
恪守不渝。

凡自行不义，  
却强人公正，  
概与我无干，  
即便假我之名。  
此乃真理，  
你当自明。

而有的却又非常“白”，如

游手好闲最卑贱，  
行尸走肉厕人间；  
上帝不屑置一顾，  
生不如死尤可怜！

但凡信仰，皆须传播，因而，译者必须对适合于传播的文体文风有所考量斟酌。当下的社会已进入图像时代或视觉时代，文字方面也随之越来越“白”。在这大趋势大潮流当中，过于讲究高深和高雅的所谓“经典味”，是否有点反动？另一方面，宗教经典都具有“永恒”的一面，不为凡尘的时尚潮流所动，这两个捏合到一起，根本就是一个矛盾！

圣经和古兰经的白话文汉译，在我看来只能说基本成功，尚有改善余地。因为，本人在翻译引用其经文的巴哈伊圣作时，发现很难照搬现有流行译本——文风及很多表达习惯不同。我觉得它们都不是纯粹的完全切合当代大陆读者口味的现代白话文。

佛经的译本皆为文言文，如今没有多少人真正能读懂，即便受过高等教育者也是如此，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 2, 英文难度问题

这个问题也跟前一个问题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对当代人而言，巴哈伊经典英译本的文字与风格既高深也陌生（《巴黎谈话——阿博都-巴哈 1911 年巴黎演讲录》也许是例外，全为浅显口语化的演讲文体，而他在北美的演讲录英译本却采用了完全不同、颇为高深难懂的文体文风）。如前所述，即便以英语为母语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阅读巴哈伊经典英文本也绝非易事。可见，巴哈伊经典译者所要面对的首道难关是英文的理解。我见过国内不少译作等身的老翻译工作者和所谓“国家一级翻译”在初次接触巴哈伊经典英文本时也惊觉其难度之高。

所谓难度，既有字面意思的理解，也有文体文风的了解，包括修辞手法和特殊表达形式。

## 3, 对其他宗教教义与圣典的了解

巴哈伊信仰的诞生离不开伊斯兰教背景，巴孛和巴哈欧拉的祖国都是波斯，都曾经是穆斯林，他们的著述里大量引用古兰经及圣训的话语，少量引用圣经。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援引圣经则更多。但总的来说，巴哈伊信仰与伊斯兰教关系最为密切，巴哈伊信仰的绝大多数概念、术语及其表达都与伊斯兰教及其圣典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巴哈伊经典引用古兰经也最多。因此，有志从事巴哈伊经典翻译工作的人士必须对这些方面加以了解，可谓“准备功夫”。

多年的翻译经历告诉我，巴哈伊经典的译者首先必须做巴哈伊的学者。

## 4, 对“文化交融”的考量——本土化？

对中国人而言，巴哈伊信仰是异域宗教，所以感到相当的新颖和陌生。翻译，无非是在文化间架设桥梁。因此，如何将这种陌生的异域宗教引介给中文读者，同时考虑其他传统宗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影响，这是每一位译者必须加以认真而周详考量的。据蔡德贵考证，巴哈伊信仰的译名先后出现不下 20 种，这就很能

说明问题。最典型的是“大同教”译法，译者一定是将这两种文化间的共通之处当做译名根据了，且以此指望读者能产生某种“共鸣”或“亲近感”。还有“God”，有“上帝”、“上苍”、“神”等不同译法，都是基于不同的考量。如赞成“上苍”者，多顾虑“上帝”或“神”的译法跟基督教相混淆。巴哈伊信仰是个新兴宗教，其全部历程至今尚不到 170 年，与传统宗教相比，算是相当晚近的“后来者”。因此，在译者的考量之中，难免不包含如何加以区分这一点。

“Moderation”——巴哈伊信仰的一条重要原则——亦为典型一例。有译“中庸”的，有译“适度”的。反对译成“中庸”的人士认为，此“中庸”非彼“中庸”（可以延伸：此“大同”非彼“大同”），亦即非“三纲五常”道统框架之中的那个“中庸之道”，不可混淆。赞成者则认为如此译法更易被中文读者接受。无论有理无理，理多理少，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译法的出发点或动机截然不同：一个旨在正意，一个旨在传播。如此情形在巴哈伊经典的汉译上并不少见。翻译工作者同时也是文化传播者，他对译文加诸的用意或选择会导致传播效果上的差异，尽管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

无论何种宗教的经典翻译，“本土化”都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问题，也许在中国语境之中更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巴哈伊经典汉译也同样如此，从基本概念和术语的传译，到采用汉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文体文风，都需要译者根据本国的文化、思维方式乃至语言特性作费心考量与斟酌。无论直译或意译，好的翻译必须达到“化”的程度，也就是所谓的“化境”，否则难免囫圇吞枣，便是夹生半熟。

本人一直有个相当“简单朴素”的观点：好的译文是那种看起来完全是用汉语独自写出来的，也就是所谓的没有“异（译）味”。

## 5, 译名标准化问题

译名标准化对宗教经典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毋庸赘述。限于篇幅，这里只是最简要地讲述一下巴哈伊译名标准化的沿革。

鉴于巴哈伊译名的混乱状况，本人在 1998 年开始对巴哈伊英汉译名进行初步的收集、整理和统一化工作，这应该是首次尝试。该工作于 2000 年基本完成，其

成果是“巴哈伊中英译名表”（或称“通用译名表”）。该译名表遵循大陆的译名标准，主要有二：1，官方出版的权威工具书，如：《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英汉大字典》，《综合英汉文科大辞典》，《世界分国地图集》。2，新华社编制的各语种译音表。极少数译名，如三位中心人物，沿用过往，还有些则依从约定俗成原则。

2001年，巴哈伊教澳门总会推出了“标准译名表”。该表虽然部分采用了本人的译名表，但其他很多译名多未依据大陆标准，其中有些明显可见依照粤语发音译订。

2012年，巴哈伊教澳门总会全面修订标准译名表，这一次终于采纳大陆译名标准，但三位中心人物的译名仍沿用旧制，只是“阿博都巴哈”增添一短杠，变成“阿博都-巴哈”。该译名表的修订可谓系统工程，邀请很多人参与，进行了多轮长时间的商讨，最终于2013年3月定稿并推用。按主事者巴哈伊译名委员会所说，该表使用期为10年，之后若有需要可再行修订和增删。……

巴哈伊经典汉译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大有可为，有待仁人志士的积极参与和探讨。